

又一部别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

——评李维武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纲》

黄 钊

近十年来,适应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教学实践的需要,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应运而生。它们宛若春日的花朵,竞相开放在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百花园中。在这个百花园里,最近我有幸摘到了一朵新蕾,这就是巴蜀书社出版的、武汉大学李维武同志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翻开这本《史纲》,我为一股清新的气息所吸引,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受益良多,久久不能忘怀。

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名教学工作者,我读过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对比之后,深感《史纲》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好教科书。

《史纲》的“历史分期、逻辑构架以及一些基本评断”大体采自肖蓬夫、李锦全两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应当指出,这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本来就有许多独到之处。它史料极其丰富,论述相当深刻,从史料的筛选、结构的安排到一些基本问题的评述,都有许多创新,在众多的中哲史教科书中,不失为一部好书。《史纲》以这部书作为自己的立足点,这本身就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加之,李维武同志是肖蓬夫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多次以该书作为教材进行中哲史教学工作。由他将该书改编为一部简要读本,自然会收到得心应手的效果。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本《史纲》,既保留了原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许多优点,又凝结了作者在许多问题上的独得之见。加之,经过文字浓缩,章节改编,显得更加简明实用。显然,这不是简单的改编,而是理论上的再创造。它具有如下一些显著特点。

其一,体系比较完整。它从我国奴隶制时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一直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从而全面展现了中华民族哲学思维发生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各种《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都只写到“五四”运动前夕;而“五四”以后的哲学思潮,则长期未纳入史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史纲》在内容上增写了“五四”后有关章节,从而弥补了以往教科书的缺陷,这无疑是一个贡献。

其二,结构比较严密。全书分作六编二十一章,前后相衔,环环紧扣,层次分明。不仅如此,它在每一编开头,都有一篇简明扼要的《绪言》。在各篇《绪言》中,作者都用一定的篇幅,阐明与各该篇相对应的历史时期内,哲学思维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例如,对于明清之际的哲学运动,《史纲》作了这样的逻辑概述:“明清之际的哲学运动,不仅有其新的理论特色,而且有其固有的逻辑进程。王守仁‘心学’中所隐伏的自我否定因素,经过泰州学派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具有异端性格的思想家。作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以其提倡‘童心’的自觉和对孔子的怀疑,对宋明道学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标志着早期启蒙哲学的开端。其后,黄宗羲从历史哲学、方以智从自然哲学等不同侧面,批判宋明道学,并力图开拓哲学认识的新方法、新途径。与此同时,合规律地涌现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剖析道学,倡导启蒙的思想家,……在这个基础上,王夫之在哲学上总其成,……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点。”这段概述,从宏观上勾画出了明清之际哲学运动发展的逻辑进程。作者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进程,谱写出了整个明清之际的哲学发展史,因而,其逻辑结构之严密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崭新的文艺理论系统

——评《艺术生产原理》

萧 作 铭

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探索和构建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体系,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是新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文艺理论教学工作者孜孜以求、长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建国伊始,为尽快适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占领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阵地的需要,通过翻译教材、举办进修班等各种方式,引进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者季摩菲耶夫、毕达可夫构建的文艺学体系的教材。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高校都在季一毕体系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了教材。60年代初,党和政府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力量编写了两部具有权威性的教材,就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与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些教材(包

括引进的和自编的)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我国高校的普及、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等方面,当然都起了毋庸置疑的巨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又组织力量对两部权威教材进行了修改,以清除“左”的思想对它们的影响,许多新编的教材也有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与此同时,文艺界思想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人们在思考、在探索、在追求。渐渐地,人们终于发现,所有这些教材,包括两部最具权威性的教材,都未能跳出季一毕体系的窠臼。渐渐地,人们还终于发现了季一毕体系的许多弱点,比如,它对“艺术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的整个文艺思想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很不理解,只是强调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比如,它未能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因

其三,中心内容突出。《史纲》采取举纲张目,以点带面的方法,把对哲学思维的综合介绍、一般哲学家的简要述评、重点哲学家的重点剖析结合起来,详略有别,繁简适宜。既注意阐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各个环节,又全面展示了历代中国哲学丰富多彩的广博内容。例如,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端重要环节,它不仅有自己的庞大思想体系,而且有一大批与之相关的思想家。《史纲》运用了上述方法,一方面对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典型人物进行重点剖析,力求全面介绍“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以帮助读者掌握宋明理学的中心点;另一方面又用综合介绍的形式,对一般的思想家,如周敦颐、邵雍等,作简要评述。这样,既突出了中心内容,又不忽略某些重要环节上一些哲学家的理论贡献,表现了作者善于裁剪的功夫。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这门学科的进一步科学化,有待于众多哲学史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史纲》作为一本探索性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也不可能一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客观地说,它在章节安排、内容归纳以及对以往哲学发展的规律性总结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磨砺。而它增写的“五四”以后哲学发展的有关内容,更需进一步完善。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同众多的中哲史教科书相较,它仍有自己的许多长处,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好教材。其存在的某些不足,也是不难弥补的。我热烈地期待着《史纲》再版时,将有许多更新的收获。